封面画展

施 敏

我工作的医院有一份国内权威的儿科医学期刊,办了四十多年了。和很多老牌医学期刊一样,封面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:画着各种网格线条、人体器官图,或者药物分子的结构。这些图传递着科学的权威感,但也让人觉得冷冰冰的,像隔着一堵墙。

但是,今年拿到第一期新杂志时,封面一下就把我“抓”住了。

那是一幅叫《星辰大海》的油画。画面是打转的旋涡形状,跳跃着红、黄、绿的色彩,给人温暖明快的感觉。画得也许不够精准,线条透着稚气,但看着它,感觉不到冰冷的病症,反而觉得直抵人心。画这幅画的,是一个10岁的自闭症孩子。每一笔色彩,都像是这个孩子无法用语言诉说的内心世界,正在向我们敞开。

策划这期封面的编辑是我的一位好朋友,他是位儿科医生。我问他,怎么会想到用自闭症孩子的画做封面?这样会不会降低杂志的学术性?

他告诉我:“很多医学实践中,一张好图有时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。”他说,这些年他对特殊儿童的看法改变了很多,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位大学教授的影响。

“有次偶然的机会,那位教授跟我聊起自闭症儿童的画。虽然我们医生和搞教育的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,但聊得越多,我越提醒自己:要把这些孩子首先看成‘儿童’,而不是只盯着‘孤独症’这个标签。语言障碍是自闭症孩子的核心困难,语言是用来表达的。当他们没法用语言表达时,必然会寻找其他的方式。画画,就成了他们无声的表达。”

后来,我读了那位教授公众号里的一段话,印象特别深。她说:“自闭症儿童首先是儿童,其次是儿童,最后还是儿童,我们必须停止把他们当作‘星星的孩子’。我们承认人类个体的多样性,但他们应该本质上还是人类,自闭症儿童无论障碍程度如何,他/她首先还是一个人类幼童。”

朋友说,第一期封面那幅画的孩子,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。那里在教自闭症孩子绘画方面,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支持方法。

第一期封面如此惊艳,让我对后面几期充满了期待。果然,接下来一期的封面又让人眼前一亮。这幅叫《春风十里》的画,作者是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女孩。她12岁了,还不会叫爸爸妈妈,却在画布上恣意泼洒出色彩,那些抽象的花卉像炸开的彩虹,感觉颜色都在“尖叫”。指导老师说:“她刚开始画画那一年,只许我站在三米外看。但现在,色彩成了她的情绪表达。”

封面画展还在继续。最近一期《绿色心情》,画面上一个抽象的人形轮廓,侧身长凳,身体里填满了红、绿、蓝,色彩像梵高的画一样浓烈炽热,仿佛传递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。

自闭症孩子常常面临语言交流的困难,画画就成了他们表达内心的重要出口。这些孩子用色彩、线条和构图,向我们传递着他们难以言说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。在自闭症画家里,最有名的可能要数被称作“人肉照相机”的斯蒂芬·威尔特希尔了。他三岁被确诊自闭症,后来父亲又因车祸去世。在伦敦的特殊教育学校里,画笔成了他唯一的语言。2001年,BBC拍过一个纪录片,记录了一个奇迹:他坐直升机在伦敦上空飞了一圈后,仅用了三个小时,就把飞过区域里的十二座古迹和两百栋建筑,分毫不差地画了下来。像他这样的自闭症画家,他们也许不会用嘴说“我爱你”或“我害怕”,却能用画笔告诉你他们眼中的世界。就像威尔特希尔用他那幅十余米长的东京画卷告诉所有人:“我不太会聊天,但请看看我的画——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全部的话。”

朋友说,读书时老师常强调,“病人”两个字,不能只看见“病”,而看不见“人”。儿童如同还未绽放的花朵,更需要儿科医生在治“病”以外,懂得去呵护“人”。在看到这些特殊儿童的画作后,有教授提议,应该把它们挂在医学院的走廊里,让未来的儿科医生们都看到。因为这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课,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,需要每位学生在凝视画作时,自省体悟。

当医学期刊的封面开始流淌特殊孩童笔下的色彩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改变,更是医学精神的回归。那些曾被诊断标准所定义的生命,正在用画笔改写医学的叙事——科学依然精准如手术刀,但握刀的手,已经被孩子们的画,温暖了。

一篇引起决斗的小说

吴克礼

文坛本是文人荟萃之地,理应讲文论道,“动口不动手”,然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则不然,文人艺术家除了讲文,还动武。

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坛决斗成风,枪声频起。戏剧《智慧的痛苦》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与人决斗如家常便饭,最终惨死异邦。不久后,国家颁布法令禁止民间决斗,但是私下里决斗仍在进行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,一次暗斗转化为明斗,这就是大诗人普希金同法国浪子邓丹斯的决斗。邓丹斯千方百计勾引已经身为人妻的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洛娃,而且有人给普希金写匿名信,极尽讽刺、挖苦、侮辱之能事,抹黑大诗人。普希金忍无可忍,接受了挑战。结果邓丹斯把“俄罗斯诗坛的太阳”射落了下来。普希金刚倒下,诗人莱蒙托夫发表了《诗人之死》矛头直指皇室,暗示宫廷是幕后黑手。此举震动了整个社会,从此莱蒙托夫闻名遐迩。孰料,没过多久莱蒙托夫也与人决斗,现场他还挺绅士,决斗时由他开第一枪,他朝天打了一枪,但对手却不客气地打中了他的要害。

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,但是火药味经常笼罩着文坛。作家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本来友情甚笃,屠格涅夫可以算是托尔斯泰的前辈、伯乐,肯定他的作品,主动把他介绍给法国读者。一次,两人意见不合,吵了起来,最后各不相让,提出用决斗来解决。《猎人笔记》的作者枪法应该不错,而他的对手在高加索实弹实枪打过仗,倘若决斗,两强相遇必有死伤。好在,两位文豪冷静下来后,理智占了上风,没有走到最后一步。

风景画大师列维坦和大作家契诃夫也差点决斗。两人年龄相仿,意趣相投,堪称莫逆,无话不谈。可就因无话不谈,差点酿成大祸。原来,莫斯科有个家庭,丈夫库夫申尼科夫是外科医生,妻子索菲娅,生活富足。索菲娅附庸风雅,喜欢结交文艺圈的朋友,经常在家开沙龙,邀请他们前来聚餐,讨论艺术问题。一次,她向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提出,想拜他为师。画家同意后,她定期去他的画室学习。一来二去,时间长了,师徒两人暗生情愫。圈内人士都知道列维坦只画风景,不画人物,但为了讨好自己的情人,他破例给她画了一幅肖像画。纸包不住火,绯闻慢慢地传遍文艺圈。列维坦在与契诃夫交谈时,得意扬扬地把这个艳遇告诉了作家。契诃夫觉得这个题材不错,回到家里,欣然命笔,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。小说的内容和情节根据需要进行了加工,主人公的名字改成蒂莫夫。作品发表后,列维坦读了怒火中烧,找上门去论理,指责作家不应该把私下里告诉他的事情写成小说去发表。现在这层窗户纸捅破了,弄得人人知晓,叫他们两人今后如何做人,叫索菲娅如何面对丈夫?说到激动处,竟然提出要与契诃夫决斗。

契诃夫比他大一岁,一向稳重而且深知其人,所以采取冷处理,不置可否。列维坦发了一通脾气后,同契诃夫断交。出乎意料的是,索菲娅的丈夫得知此事,既不动怒,也不吵闹,他家的沙龙照旧宾客盈门,他本人还为画家佩罗夫客串当模特儿。过了一段时间,列维坦心火渐熄,找到契诃夫重修旧好。其实,列维坦要求决斗只是嘴上说说而已,他既不会舞刀又不会弄枪,能拿的唯有画笔,而契诃夫可能用手术刀比舞刀弄枪更在行。再就作家的性格而言,根本不可能应战。决斗云云,只是历史的惯性耳。

规划一场“壮游”

李诗杨

边看边聊

近年来,“特种兵式旅游”特别火热。年轻人在时间、预算与社交需求夹缝中衍生出如此这般的旅游形态,主打“极限挑战”,以高强度、高效率为核心,提前制定详细攻略,精确到每分钟行程,避免时间浪费,在短时间内密集打卡多个景点,行程安排紧凑如“军事任务”;选择低价交通(如夜班火车)、简化住宿(如青旅)、节省餐饮开支;行程常通过短视频、图文在社交平台分享,形成“种草—跟风”效应,追求“花最少的钱、走最多的地方、看最多的风景”。

一方面,它体现出一种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果敢和行动力;另一方面,却也折射出快节奏社会下的“体验焦虑”,而隐忧也开始显现: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快节奏、极限打卡一长串景点、一天吃过多顿餐……无不损害着身体健康;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活动和行程,可能会导致时间压力过大,影响返校后的学习生活;一些所谓“冷门出片点”的安全隐患问题也让人担心。盲目追求高效和“流量”的碎片化旅游模式,更让许多青年人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景点只能走马观花,不能够沉下心真切地感受。旅行,似乎充满了“短平快”的功利色彩。

以上种种,不禁让人思索:是否应当好好规划一场“壮游”。

“壮游”这个词并非新词。杜甫曾写长诗《壮游》,历数自己年轻时开始周游天下、尽览雄浑山河的经历。壮游,其实是一种将旅行与人生、与世界紧密结合的深度探索。其“壮”在“志”,“志”在用心。李白“仰天长啸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迈是壮游,徐霞客“达人所之未达,探人所之未知”的探险是壮游。最伟大的历史作品之一《史记》,也是在司马迁“读无字之书,禀山川豪气”之中,终能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即以今人而言,陈丹青《无知的游历》,一番全身心的出走,以“写生法”用文字描摹所见,这种心态也与壮游者相似,是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,踏上未知的旅程,不断学习和领悟;刘子超用旅行写作在文学坐标系里留下自己的位置,对人性、历史和文化深刻思考,不仅在地理上探索,更是在历史和现实中进行深度挖掘……

前段时间,《旅行人信札》再版发售。1981年,青年时代的陈嘉映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,临近毕业之前的春天,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,写下25封书信。原本是亲友之间的私人叙事,后被编辑成书,令许多人津津乐道,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怀鼓舞。他对这番出走在信中也有表达:“即使身处真情实意之中,人也该有一个机会出离他处熟的环境,中止不断重复的话语,在寂寞中同自己交流,从沉默的方面把生活再体会一遍。”他说:“这万里之游,吃住最差的,欣赏最美的,孕育最高的。”这种志气、体悟与胸襟,却是当代人罕少抱持和抒发的。

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走向旷野,走向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的地方,其实是很值得鼓励的。有勇气出走,本身就是难得的果敢。只不过,走出去之后,如何走?看什么?又最终是为了什么?如若能带上思考,不仅身体踏向这个世界,眼界、头脑也拥向这个世界,这可能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。

雨后初霁 钱政兴 摄

观花

陆 岸

我不养花,也不识花。不问贵贱,只求喜欢。

十枝一束,齐头并足。但花苞有大小,枝叶有密疏。裁以长短,投以净瓶,几枝亲水,几枝向阳,几枝横斜,几枝秀逸。淡彩浓妆,早开迟谢,几朵圆满如秋月,几朵缺落如豁齿,几朵颓放如快婿,几朵婉软如流目。

花尚如此,何况人乎?

丰子恺画《残废的美》,规讽插花,美而不仁。可是天地不仁,脱胎入世,人何异于断根的花?饱暖由人,开败听天,负阴抱阳,顾影自怜而已。

恍然人世如巨甕,千姿百态,更胜瓶花。不足博君一观么?

七夕会

十一岁的独立旅程

杨俊蕾

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佳作,余华早期作品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近些天来却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。原因是正在读小学的女儿,一直和我商议如何自己上学,放学后也独立回家的事。

起初,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十一岁的五年级小学生,自己刷卡乘地铁,经过六站,走过两个红绿灯路口,才能安全进校。返程亦如是。在脑中想象着每天接送她走过的道路,前额发紧,后背涔涔冒出汗来。

然而有一天,孩子爸爸在外地出差,密集的工作让我实在难以抽出时间去接放学。于是女儿和我约好,她在出校园的时候,借用班主任的手机先给我发一条语音留言,内容是“老妈,我们现在放学了”,收到信息后,我就从办公室出发,朝小区附近的地铁站走过去,在约定好的地方——交通卡服务中心的窗口前等她。

路上还算正常。我挎着电脑包,脑子里还在盘桓着工作上的种种难题。怎样推进课题的进展?怎样在内容设计中将真正的数智化教学实践落到实处?学生的课程论文、学位论文一篇篇,哪些可以提出大修建议,哪些年轻人可能正处在情绪低潮期,切不可马上加以督促……踏入地铁站,站在等候地点的刹那,我却开始无法控制地心绪慌乱。眼前是潮水般涌动的上车乘客与下车乘客。他们急匆匆地走啊跑啊,有些人拖着沉重的箱子,却依旧挣扎着向电梯挤去。满眼都是似曾相识却完全陌生的面孔。

理智告诉我,不要着急。孩子16:40从校园放学出发,步行10分钟到地铁站。毛估估站台上的等候时间,以及地铁驶过六站的车程,至少又是15分钟。等到出了车厢门,排队上扶梯,又是5分钟。所以,40分钟的站内等候,是我必须承受的心理煎熬。

我不敢向别人倾诉这40分钟的实际感受,只是在劝阻女儿不要这么早开始独自放学时对她说:这是我迄今为止感到最可怕的状态。一眼望去,目力所及之处,看不到孩子,简直是天塌地陷一般的扑面重压。且因为学校的纪律规定,我还没有及时添置电话手表,也就是说,在这40分钟内,我在纯粹的信息意义上与娃失联。

比可怕更可怕。我曾详细地告诉孩子,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多么地难以承担。女儿激烈地反驳:“妈妈,你不用这么担心。我们班某某某,某某,某某某,还有某某某,某某,早就自己上下学了。而且还有需要地铁换乘的,从杨浦区一路坐到浦东。”女儿看我的愁容中隐约显出犹豫的神色,不失时机地加大了语言攻势:“家长都是关心孩子的,能够让孩子自己上下学,说明路上是安全的。而且,我总归是要长大的。”

站在交通卡服务窗口前,一遍遍回想着我们在家里,在路上,在很多时候都要反复进行的争论。每天接放学需提前近一个小时出发,有时候放学节奏稍微拖沓一下,回到家已经是天要擦黑的光景。我慌忙做晚餐,孩子马不停蹄地练琴,写作业……等到我洗洗涮涮终于坐回桌子前,沉重的睡意与浑身上下的酸痛一起袭来,很难全神贯注地投入阅读或写作。孩子正是发现了这一点,才主动提出独自放学回家,腾出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,让我去读想读的书,去写想写的文字。母女朝夕共处,我怎会不明白她对我的体谅和心意?

但是我仍然无法抑制地紧张。望着一波又一波到站出站的人们,我不由自主掐紧了胳膊,仿佛肢体上的疼痛能够帮助我坚强清醒,能够让我不再胡思乱想。终于,那张脸庞在人群中出现,胖嘟嘟,汗津津的。矮矮的小个子背着超大号书包,一手拎着她的小饭兜。开始时她装作认真走路,目不斜视;到了刷卡出闸机的时候,像是突然发现我似的,欢快地对我打招呼:“Hello老妈!”

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我心里的快乐。我也不介意孩子发现我的眼里泛起泪花。那一刻我理解到“十八岁出门远行”的隐含意味。长大的少年走出家门,背后是永无休止的爱与牵挂,而远行所要去往的地方,是我们为父为母者希望孩子尽力抵达的理想。

养育